



《人物志》： 全面展现中国古代人才学思想

□ 肖 遥

《人物志》是中国古代一部全面展现人才学思想的著作。它出自《隋书·经籍志》，成文于青龙四年（公元236年）之前。其作者刘劭，是一位著述颇丰的学者。刘劭字孔才，广平郡邯郸（今河北邯郸）人，是三国时期著名的曹魏大臣、建安名法派思想家。他从政经历丰富，曾先后在汉献帝刘协、魏文帝曹丕、魏明帝曹叡时期，任广平郡上计吏、郎吏、太子舍人、秘书郎、尚书郎、散骑侍郎、陈留太守、骑都尉、散骑常侍等官职，晚年从事经学传授，约于正始中期逝世。长达三十多年的官场生涯，为刘劭积累了丰富的为官经验，在刘劭所生活的年代，九品中正制创立并推行，人物品评活动兴盛，这一时期官场上具有“识人知人”能力的人物，普遍受到士人推崇，从中涌现出一批人才学家。他们或凭借自身经验、或通过理论研究，写出多部人才学著作，《人物志》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共十二篇，作者以人才为考察对象，从十二个不同角度，深入探讨了人才问题，系统阐述了完整的人才体系。

人才分类

在《九征》篇中，刘劭通过由表入里的方式，从人的九种体表特征——精神、眼神、气息、脸色、仪态、容貌、言语、骨骼、筋腱出发，通过观察这九种外在表现，判断出这个人内在的资质。“凡人之质量，中和最贵矣”，能够将“九征”全部完善，且内里和谐，性情中和平淡，这样的人就达至中庸，成为了圣人。相反，那些在“九征”中，只有一部分特质完善或突出的人才，就属于“偏至之材”。能够被评为人才的人，必须要在“九征”中，找到其或完善、或突出的部分。而“九征”之所以能够表现一个人的资质，是由于人的聪明智慧来源于阴阳二气之精华，“阴阳清和，则中睿外明”，阴阳二气决定了一个人的性格是内向还是外向，而与阴阳二气相配合的，是五行之气，即木、金、土、水、火，它们分别对应人身上的骨骼、筋腱、气息、肌肉、血液这五种生理组织，这些生理组织又分别决定了仁、义、礼、智、信这五种品德，并通过“九征”表现出来。

在对人才进行初步分类后，刘劭在《体别篇》中，又根据人所吸收阴阳二气的差异，将人才的性格分为两大类，即中庸型和偏颇型。中庸型性格的人才，可塑性最强，能够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展现出不同的性格特点，从而与各类人交流。而偏颇型人才由于所受的阴阳二气不均衡，性格表现出或刚强、或柔弱的特点。刘劭认为，偏材之人的性格，总共分为十二种，分别为强毅型、柔顺型、雄悍型、惧慎型、凌轹型、辨博型、弘普型、狷介型、休动型、沉静型、朴露型、韬隐型。这十二种性格为阴阳相对、一正一反，每种性格的长处和短处均十分明显。接下来，在《流业》篇中，刘劭将十二种偏颇型人才按照他们各自擅长的领域，划分为管理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前者包括清节家、法家、术家、国体、器能、臧否、伎俩、智意；后者包括文章、儒学、口辩、雄杰。这些人才蕴含着不同的能力，能够在官场上施展出自身的才华。

对于能够领导不同人才的人物，刘劭亦

有思考。在《英雄》篇中，作者讨论了英雄人物的材质，将英雄细分为“英材”和“雄材”。其中，聪明秀丽、能够进行战略谋划、从中发现战机的人物，可被称之为“英材”；胆识过人、关键时刻勇敢果断、外加力气盖世的人物，可被称之为“雄材”。从这两类人才的特点来看，“英材”重文韬，“雄材”重武略，均是极为优秀的人才。但这两者又需要相互补充，“能役英与雄，故能成大业也”，同时具备英材与雄材的人物，能够成就一番霸业。

人才鉴别

在对不同的人才进行分类后，刘劭还详细阐述了鉴别人才的方法。《接识》篇提到，真正广识人才的人，既能做到“识同体之善”，又不失“异量之美”。人与人初相遇时，一般最先通过谈话交流来认识对方，鉴别者要想观察人某一方面的才能，只需一个早上的谈话便能知晓。但鉴别者不仅要辨别出同类人才，更要能发现那些与自身资质不同的人才，再根据人才能力的大小，判断出哪些人是“国体之人”，即具备好几种能力的决策型人才。这样一来，鉴别者就需要从道德、法制、策术三个方面，与对方进行为期三日的对话，从而使其才能完全展现出来，没有疑虑地提拔并重用之。

刘劭认为，鉴别人才是一项细致的工作，尤其是对偏材的鉴别。《八观》篇详细介绍了鉴别人才的八种方法。具体而言，一是“观其夺救，以明间杂”。鉴别者在观察一个人时，既要看到这个人善良的一面，同时还要观察此人有没有恶劣的品质，过滤掉那些恶大于善的间杂之人。二是“观其感变，以审常度”。在官场上，人们常掩盖自己的真性情，鉴别者如果要探究一个人最真实的性格，就需要通过察言观色，判断此人是否言行一致。三是“观其至质，以知其名”，也就是观察人才的美德和所获得的美誉，以知晓其名号的高低。四是“观其所由，以辨佞似”。依似是表面上与偏材类似，实则人品低劣的人。这类人的行为有时与偏材一致，但区分两者的关键，在于其行为背后的动机有所不同，偏材力求公正，而佞似试图通过陷害他人来达到升官发财的目的，表面一套背后一套，这类人属于伪偏材。五是“观其爱敬，以知通塞”。仁爱和礼敬乃为人之根本。人如果有爱与敬的诚心，就能顺应天道，与他人友善相处，拥有良好人缘，积累宽广人脉，仕途更为平顺。六是“观其情机，以辨怨感”。在人际交往中，小人往往心胸狭隘、情绪起伏、难容他人；而君子却能宽恕他人、控制情绪、严于律己。这就需要鉴别者通过谈话去试探对方，观察其情绪变化，辨别出君子和小人。七是“观其所短，以知所长”。偏材都有一定的缺点，并能被他人敏锐地察觉到。但通过了解一个人的缺点，鉴别者亦能推知此人的优点，从而为其找到合适的岗位。八是“观其聪明，以知所达”。鉴别者根据一个人所拥有聪明智慧的高低，能够预判此人未来的功业。

在刘劭看来，八种鉴别人才的方式已较为全面。但在辨人识人的过程中，鉴别者还可能会出现七种谬误，他们或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或以自身好恶为标准去评判他人、或无法判断人才才智高低、或不懂得人的成

材有早有晚、或更偏爱与自身才智相当的人、或单纯凭借名声和地位去判断一个人的高下、或因能力不足而无法辨别出奇才人物。这就从两个方面，牵涉到人才鉴别的困难之处，一是准确识别人才较难；二是“无由得效之难”，即鉴别者因不在其位，而难以提拔重用所发现的人才。人们总是希望良才能遇知音，但现实情况却是两者相识相知的机会较少。因此，刘劭感慨道，人才学是一门难以穷尽的学问，人才鉴别更是需要久久为功。最后，刘劭用老子“夫唯不争，则天下莫能与之争”的道理，劝诫领导者礼贤下士、君子贵柔不争。这一建议至今仍具有现实意义。现代社会发展迅速，人与人之间存在激烈竞争，但通过观察可以发现，那些谦逊低调、勤勉做事的人，往往能在关键时刻展现出自身的硬实力，赢得他人尊敬。

人才任用

综观刘劭《人物志》中的十二篇文章，可以发现，全书是围绕着圣贤之人和偏材之人之间的关系而展开的。对于圣人贤者而言，其最大的聪明才智，就是能够识别人才。而识别人才的最终目的，是使“众材得其序”，即按照高低次序，将不同人才安放到合适的岗位上去，发挥出人才的全部能力。刘劭指出，人才对于任何朝代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古代的圣贤之人，如尧、舜、商汤、周文王等，之所以能流芳千古，正是由于他们在寻求到人才后，合理地任用了人才，君臣同心，才建立了广为世人称颂的丰功伟绩。

在人才任用方面，刘劭认为，除圣贤外，任何一类偏材的性格，都既有优点又有缺点，这些性格本身无所谓高与低、好与坏，只要其从事的工作与自身性格相符即可。如有的人才性格果敢刚毅，遇事能够当机立断，就适合在司法部门工作，担任司寇一职；有的人才性情温和平顺，为人质朴友善，就能够从事文化教育工作，承担安民之任；有的人才善于言辞表达，热衷与人打交道，就可以负责接待外宾，从事外交活动；还有的人才体格高大威武，勇猛善战，就可担任将帅之任，到前线指挥千军万马；等等。除此之外，在人才任用中，还常存在一个误区，即不少人认为“人才有能大而不能小”，就像烹牛的鼎无法用来煮鸡一样，杰出人才只能干大事，而无法屈尊去做小事。对此，刘劭反驳道，人才的能力本就有大有小，按照职位高低录用人才，将人才放到适合自身的位置上去，才是最重要的。能够治理大部的大材，自然也能够管理好小郡，只是“人才各有所宜”。大材更适合干大事而已，让大材来治理小郡，会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而一旦将人才放错位置，就是任用人才不当，还有可能给统治者带来灾难。因此，对于人才的任用，关键在于“量材用人”。



势，通过召开座谈会、研讨会等方式，提炼提升学员智慧经验，推出更多有分量、可转化的对策建议。以办学质量评估整改为契机，把长板优势总结好，把问题弱项分析透，逐一拿出务实举措，清单化、闭环式抓好整改，推动办学质量不断提升。

持续严格校风学风。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从严治校也永远在路上，必须始终坚持严以治校、严以治教、严以治学，把从严治校的要求贯彻到党校工作全过程各方面。严格教师管理，强化党纪国法、校规校纪、师德师风教育，引导党校教师站稳政治立场、坚定信仰信念、恪守学术规范、严守纪律规矩。严格学员管理，严格执行中组部学员管理规定和党校相关制度，坚持和完善校委会督查、进修部巡查、学员管理委员会检查、学员临时党支部自查、派驻纪检组抽查“学风五查”等机制，让学员一进党校就感受到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明之风。严格落实意识形态责任制，健全完善课堂教学全程录像、教案审核和教师外出授课报备等制度，全方位加强对校报校刊、课堂讲坛、网络平台等阵地监管，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作者系安徽省委副书记、省委党校（行政学院）校（院）长〕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雁门关所在的三晋地区一直是中原民族同北方各少数民族频繁交往、交流与融合的大舞台。春秋后期，雁门关一带成为晋国北陲。之后的数千年，北方各民族从蒙古大草原相继南徙，雁门关便成为各民族交流与融合的见证者。而这一边塞重地的开启与闭合，正是华夏各民族间战争与和平更迭的历史大幕。当关门紧闭、烽燧升腾之际，便是民族间金戈交鸣、马蹄声碎之时；而当关门开启、车马相通之时，便是中华民族内外迁徙、水乳交融之际。

战争与冲突——民族交融的激烈变奏

中国历史上，每逢重要的大分化、大融合、大动荡时期，随着原有政权格局的破坏、民族结构的重组，文化都在深度交流中得到发展，民族融合不断得到加强。雁门关南控中原，北抵漠原，处于民族交往的前沿地带，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中原农耕文化和草原游牧文化彼此接触、碰撞的连接点。历代统治者将雁门关精心打造成一套庞大、完整的军防体系，成为中原历朝与北方民族政权组织必争的咽喉要塞和横在漠北与中原之间“交流—融合—交战—再融合”的主门户，对促进中原民族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民族融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历史上，无论是蒙恬、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还是李靖、李勣征讨突厥，均是以雁门关作为出击之地。而唐末的沙陀族首领李克用又以雁门关为根据地，奠定了后唐大业。到宋、明，雁门关又作为中原王朝对抗契丹、靺鞨、瓦剌的前沿，大伤明朝元气的“土木之变”就是源起于雁门关北面的大同。

与各民族流离失所、生产严重破坏的苦难相伴随，冲突、战争也会孕育出民族融合。据明人廖希颜《三关志》记载，上古时期有鬼方、林胡、楼烦等民族，之后则有在北方称雄一时的匈奴、乌桓、鲜卑、柔然、突厥、契丹、女真、蒙古等，还有少数部族的别支和小部落，如匈奴铁弗部、突厥沙陀部、蒙古俺答等，均与中原民族发生过冲突、战争，他们或袭扰雁门，或破关直入中原，或因政治孤立、军事失败而投降内附。正是这一次次的战争与冲突，成为中华民族交流、交融伟大乐章中的激烈变奏。从五胡入华到五胡融华，这些在雁门大地上留下了踪迹和印痕的古老民族不断融合、消失，又有新的民族不断诞生、兴起，奠定了中华多民族大家庭的民族基础。

交流与互鉴——民族融合的璀璨协奏

在我国古代民族关系史上，中原农耕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既有战争、冲突的一面，也有互援互补、互相效法的一面。纵观中国古代入居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无不把延揽优秀的汉族知识分子、构建与中原农耕文明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作为首要任务。反过来，粗犷强劲的游牧文化也同样会受到中原农耕民族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他们的骑射技术以及来自远方的异域文化，成为中原民族积极汲取的精神养料。正是通过这种相互交流与借鉴，中原民族和北方少数民族同心协力，谱写了中华民族交流、交融史上一曲璀璨乐章。而雁门关作为民族交往、交流的前沿，所见证的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互相效法的典型事例，当属战国时期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和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改制。

据《三关志》载：“三卿分晋，属赵，赵以李牧守雁门。”当时赵国不但要与秦、齐、燕、魏等大国争衡，更要与林胡、楼烦等部族敌对。赵武灵王即位后，毅然效法雁门关以北的游牧民族，实行胡服骑射，组织起便捷迅速的骑兵。胡服与骑射是互相联系的习俗，凝结着游牧民族长期逐水草而居的生活经验。为了骑马，就必须改变华夏传统的逢衣博带、宽袍大袖的衣制，穿上更适合骑乘的短小衣服。对此，赵武灵王采取了一视同仁的态度，吸收各个民族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使得赵国军事实力迅速壮大，领土向西向北发展，进一步打破了华夏族与北方各民族的地域界限，促进了各民族间交往、交流与发展，加快了民族融合的步伐。

与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改革相对应的，北魏孝文帝的改制则是北方民族政权效法中原文化的典型事实。作为鲜卑族卓越的政治家，孝文帝拓跋宏清醒地意识到中原制度、文化的先进之处，因而积极推行汉化改革。为了彻底完成改革，孝文帝以讨伐南朝为由，率军从雁门关北方的原都城代郡平城（今山西大同）出发，跨过雁门关南下迁都洛阳，之后推行了禁胡服、断北语、改复姓、改族姓、班禄制等改革，实现了彻底的移风易俗。孝文帝改制是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自觉推行华夏化进程的一次政治改革行动，也是北方各民族陆续进入中原后民族融合的一次深刻总结，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外徙与内迁——民族融合的不绝交响

王桐龄在《中国民族史》中提出了考察民族交融进程的八个变量：杂居、杂婚、更名、改姓、养子、易服色、学语言、接受汉人道德伦理，而这一切又都以民族迁移作为前提条件。历史上，雁门关地区的民族融合也是以关内中原民族人口的外徙与关外各少数民族人口的内迁为基础的。数千年间，各民族间的这种交往、迁移、融合持续不断，成为中华民族交流、交融伟大乐章的不绝交响。

雁门关内中原民族人口的外徙主要是伴随和平期间与北方各民族通商互市而出现的。中原王朝同少数民族在边界互市、交流物资、传输技术的记载，从汉唐到宋明历代不绝于书。尤其是明中后期以后的三百余年，雁门关古道成为中原人走西口对外谋生的重要交通线。山西商人利用这种便利条件，将商路一直延伸至莫斯科乃至欧洲腹地，成为中国连接世界的一条重要商道。其间伴随着频繁的人口迁移，大量的中原人出雁门、走西口，迁移、定居到今天的内蒙古，并把许多农耕文化、习俗传播到当地。像中原汉族的婚俗就对蒙古族产生了广泛影响，大到婚俗文化中的“六礼”，小到命相八字、拜礼讨名等具体婚礼仪式。《绥远通志稿》载：“近年省城仕官之家，多趋向汉制”，“骑马之习亦渐不行，而迎新嫁均代以轿矣。”而走西口的中原人同样受到蒙古族生活习惯的影响，许多穿梭于口内、口外的中原人最终定居内蒙古，他们入乡随俗，衣裳服、行蒙俗、入蒙籍、与蒙古族通婚，过起了蒙化的汉族生活。这种人口迁移促进了中原民族与少数民族经济、文化成果的交流、交融，有力地推动了内蒙古地区的民族融合。雁门关之所以被视为民族融合的门户，还在于见证了关外各民族人口的内迁，并逐渐接受中原文化洗礼，与中原民族融为一体。历史上，三晋地区曾多次安置内迁的少数民族，雁门关附近的大同、忻州、太原等地均有少数民族与当地杂居。十六国前赵政权的奠基人刘渊就是东汉末年内迁到忻州一带的南匈奴后裔，其家族深受汉文化的熏陶。据《晋书》载，刘渊及其家庭成员多好学《毛诗》，其本人更是师从名士崔游学习儒家经学。正是在这种民族杂居的环境中，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不断，民族差异不断消融。像金、元时代的著名文学家元好问亦是生于忻州，据郝经《遗山先生墓铭》载，元好问本为北魏皇室鲜卑拓跋氏的后裔，但经过数百年，鲜卑族早已融入中华民族。而元好问亦以中原文化的传承者自许，高唱“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勒川”，充满自豪之情，形象地传达出民族迁移、文化交流对民族融合的促进作用。

在华夏数千年历史上，雁门关见证了北方少数民族与中原民族的交流与融合，他们或温和交融，或激烈冲突，或内迁外徙，杂居通婚，血液交融，渐渐具备相近或共同的文化信仰、习俗，民族差别消失，最终汇入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伟大洪流之中，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与光辉灿烂的文明。

（上接1版） 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从严治校、质量立校的重要论述,努力推动办学治校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守党校初心，就必须始终坚持从严治校、质量立校”，并明确要求党校在办学治校上必须要“遵循最严格的政治标准、学术标准、教学标准、管理标准”，发挥“不正之风‘净化器’、党性锻炼‘大熔炉’、全面从严治党‘风向标’”的作用”。这些重大要求，把从严治校和质量立校辩证统一起来，既深刻揭示了党校办学治校的规律，又鲜明指出了推动党校事业发展的方针，为如何坚守党校初心提供了根本遵循和重要抓手。我们要把严的要求和质的提升贯穿办学治校全过程，为党校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持续深化人才强校。在党校所有财富中，教师和其他各类人才是最宝贵的财富；在党校所有资源中，优秀教师和优秀人才是最急需的资源。突出人才规划引领，加强引